

特約撰述

# 中央歐亞研究對俄羅斯與後蘇聯 研究之貢獻

The Contribution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to Russian  
and Post-Soviet Studies and Beyond

宇山智彥

## 壹、中央歐亞研究之現狀

從 1990 年代後期到 2000 年代，從事中亞（或廣義歐亞）研究之數量急速增加。<sup>1</sup>許多研究機構與組織重新命名時，都包含了「歐亞」（Eurasian）這個詞，例如東歐和歐亞研究協會（ASEEES）、哈佛大學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以及北海道大學斯拉夫歐亞研究中心等，這些都反映了中央歐亞地區在後蘇聯研究中的重要性。

然而，中央歐亞研究未來仍有被邊緣化的風險，其原因包括 3 點：（1）首先是中央歐亞很少成為全球政治焦點，儘管在蘇聯解體後，有些人預測中亞會成為一個永久伴隨著衝突的區域，幸運的是比起中東與阿富汗，甚至是歷史上中亞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東突厥斯坦（新疆），中亞還是相對穩定的。儘管很多作家關注於中央歐亞地區的「新大博奕」（New Great Game），但這個俄羅斯與西方之間

---

<sup>1</sup> 所謂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意指包含蒙古、東突厥斯坦、阿富汗及其周邊在內的廣大地域。

權力遊戲的主戰場，至少此時是烏克蘭而非中央歐亞。(2) 雖然沒有具體數據，至少在日本，主修中央歐亞的研究生數量似乎正在下降，其原因或來自世代經歷的不同，目前這個領域的專家現在正值 30-40 歲，他們多半在學生時期接收到經濟改革 (perestroika) 與蘇聯瓦解後的消息，印象裡對中央歐亞的未來發展感到興趣，但最近的學生則相對較少收到對此領域之生動且正面之訊息。(3) 雖然中央歐亞領域的研究在過去 20 年大幅進展，最近卻幾乎沒有創新的作品出現，這點在下面會有更詳細的探討。

在本文中，個人將試著先概述中央歐亞研究對「俄羅斯/蘇維埃/後蘇聯研究」的貢獻，再說明在區域比較研究以及具體的帝國歷史比較中，歐亞研究擁有的價值，接著探討未來該如何預防中央歐亞研究之邊緣化挑戰。由於個人是一個日本的中央歐亞（特別聚焦於中亞）現代史與政治研究者，因此重點將特別放於西方與日本的中央歐亞領域研究。

## 貳、當代日本與西方之中央歐亞研究演進

中央歐亞研究有個顯著的特色，亦即將其視為俄羅斯與東方（特別是伊斯蘭）研究之間的連接區。然而在蘇聯時期，它一方面被劃分到由一小群蘇聯學者主導的現代研究中，另一方面被東方學家劃分到近代的歷史研究中。多數學者（其中最著名的為研究俄羅斯帝國與蘇聯治下伊斯蘭文化的 Alexandre Bennigsen 以及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必須仰賴俄文與突厥文的文獻資料，能使用的韃靼人與當地人作品因取得的管道有限，只佔少數。<sup>2</sup>Edward Allworth 是一

---

<sup>2</sup> See, e.g., Alexandre A. Bennigsen and S. Enders Wimbush, *Muslim National Commun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the Colonial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Réforme et*

個例外，他在研究文學與知識史時曾密集地使用烏茲別克的文獻資料。<sup>3</sup>日本有兩個土耳其與伊斯蘭史專家，山內昌之和小松久男，他們開創了對於現代中央歐亞的穆斯林研究，山內先生如同 **Alexandre Bennigsen**，進行對於 **Mirsaid Sultangaliev** 的研究，小松先生則在使用波斯文與突厥文的文獻基礎上，展開了對札吉德主義（**Jadidism**）的研究。<sup>4</sup>有一點必須提到，間野英二及其他中古研究專家在 1970 年代批評舊世代人們過度依賴中文文獻後，「透過本地文獻資料來研究中亞」成為了日本歷史學家的座右銘，<sup>5</sup>而小松先生在他的札吉德主義研究中直接將此準則納入實作。

蘇聯解體後，中亞及高加索地區獨立國家的湧現及經濟改革期間的種族問題，大大地引起西方與日本學者的注意。因為有了研究前蘇聯中央歐亞地區的機會（這在以往幾乎不可能），於是新世代的研究者出現了。但在 1990 年代初，一些研究俄羅斯與中東地區的專家常在寫到當代中央歐亞地區時，缺少該領域相關知識，與少數中央歐亞專家的合作也不深入，甚至有些中東研究者稱中亞為「新中東」，彷彿穆斯林特性可直接使兩區域合而為一，無視於它們之間超過一世紀之久之完全不同的現代性。

前述狀況在 1990 年代中期有了本質改變，包括原先鑽研俄羅斯與東方研究的中央歐亞專家，聯合建立了一個獨立研究領域。在西方，除創立於 1985 年的歐洲中亞研究協會（**ESCAS**），1996 年威斯康

---

*révolution chez les musulmans de l'Empire russe: Bukhara 1867-1924*(Paris: Armand Colin, 1966).

<sup>3</sup> Edward Allworth, *Uzbek Literary Politics* (London: Mouton, 1964).

<sup>4</sup> 山內昌之，《スルタンガリエフの夢：イスラム世界とロシア革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 年）；小松久男，《革命の中央アジア—あるジャディードの肖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 年）。**Jadid** 是 19 世紀末在俄國韃靼人社會中興起的新式教育，重視現代世俗知識，後來衍生出全方面之現代改革。

<sup>5</sup> 間野英二，《中央アジアの歴史》（東京：講談社，1977 年）。

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創辦了中亞區域研究年會，此年會在 2000 年轉變為了中央歐亞研究學會（CESS）；在日本，很多機構開始進行中亞或中央歐亞地區研究計畫，其中在東京大學的中亞研究網，有著伊斯蘭區域研究企劃的架構（1997-2002），之後在 2004 年，創立了日本中亞研究協會。

在研究內容方面，俄羅斯和東方/伊斯蘭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的研究，在俄羅斯帝國研究中產生了創新成果。1997 年出版的 *Russian's Orient* 意義不凡，<sup>6</sup>其主要目的是介紹進行殖民研究的方法，以及將文化人類學帶入俄羅斯帝國研究中，該書作者群分析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本質上的不平等」，並用兩種方法解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以「國家牢籠」為例）二元關係之固有體制；首先，他們在帝國中 finding 極為多樣性的人們，包括那些偶爾「變成當地人」的俄羅斯人，並發現被殖民者對於帝國的態度非常多元化，從抗拒到包容都有。這說明了中央歐亞知識分子常常將俄羅斯正向化，來強化現代主義思想及對舊有統治的批評，<sup>7</sup>而揭露這些的並非俄羅斯帝國主義的辯護者，而是那些精熟於東方語言文獻的學者們，例如像 Adeb Khalid、Jo-Ann Gross、Edward Lazzerini 等。1998 年，Khalid 在他的論文中，很具說服力地將突厥斯坦中的扎吉德主義，視為俄羅斯統治下文化資本與習性轉變後的產物。我自己分析了哈薩克知識分子身在遊牧民族、伊斯蘭民族和俄羅斯民族間交叉點的世界觀，強調比起從事反抗，為了自身現代化發展而去應用俄羅斯（歐洲）文化更為重要。之後，小松先生也鑽研了伊斯蘭傳統與現代主義知識分子

---

<sup>6</sup> Daniel R. Brower and Edward J. Lazzerini, eds.,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7</sup> Adeb Khalid,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 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所寫的文件，揭露了他們用 *Dar al-Islam*（伊斯蘭的土地）概念來正當化俄羅斯的統治，同時追求穆斯林在突厥斯坦的自治權。<sup>8</sup>

自 1990 年代起，可密集使用來自前蘇聯國家之檔案資料也帶來了所謂檔案革命，再次展示俄羅斯文獻資料對中央歐亞研究的重要性。例如 Robert Crews 和長繩宣博等人融合了俄羅斯與韃靼之文獻資料，在這方向成功地進行了研究。<sup>9</sup>然而必須說的是，透過機構如穆斯林精神會、地方自治組織和軍方部隊產生的烏拉山脈地區之社會與國家間互動密切之觀點，並無法直接應用於其他地區，特別是缺少這些機構的中亞地區。不過，就像我和 Paolo Sartori 等人所展示的，中亞穆斯林經常為了他們自己，主動挪用了帝國的制度（例如請願）與論述。<sup>10</sup>

另一個結合俄羅斯與東方研究的挑戰趨勢是跨界調查，那些嚴格遵循傳統研究中國、滿州和蒙古資料的日本史學家們，試著將這些資料與俄羅斯、突厥、以及波斯的資料結合，用以分析中亞地區的中（清朝）俄關係，例如野田仁的作品。<sup>11</sup>跨越俄羅斯帝國西南邊界地區的政治與宗教研究，雖未必以非俄羅斯地區文獻為基礎，卻

---

<sup>8</sup> Komatsu Hisao, "Dar al-Islam under Russian Rule as Understood by Turkestani Muslim Intellectuals," in Uyama Tomohiko, ed., *Empire, Islam,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asi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7), pp.3-21.

<sup>9</sup> Robert D. Crews, *For Prophet and Tsar: Islam and Empire i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Naganawa Norihiro, "Molding the Muslim Community through the Tsarist Administration: *Mahall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Orenburg Mohammedan Spiritual Assembly after 1905," *Acta Slavica Iaponica* 23 (2006), pp.101-23.

<sup>10</sup> Paolo Sartori, "Behind a Petition: Why Muslim's Appeals Increased in Turkestan under Russian Rule," *Asiatische Studien/Etudes asiatiques* 63:2(2009), pp.401-34; Uyama Tomohiko, "A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Kazakh Intellectuals and Russian Administrators: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Dala Walayatining Gazeti* (1888-1902)," in Hayashi Tadayuki, 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stories in Slavic Eurasi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3), pp.237-59.

<sup>11</sup> 野田仁，《露清帝国とカザフ=ハン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年）。

揭露了跨國界兵力投射和俄羅斯帝國人民與相同信念之外國人間的互動兩者的複雜性。<sup>12</sup>俄羅斯帝國與鄂圖曼帝國邊界地帶（特別是高加索區）錯綜複雜的歷史，包括種族之間與國家之間的衝突，最近同樣成為了熱門的研究主題。<sup>13</sup>

### 參、當代中央歐亞研究之貢獻

總的來說，比起 20 多年前，中央歐亞地區的歷史研究幫助人們更細緻且複雜地闡明了俄羅斯帝國的本質，顯示了中央與邊陲不平等的共生關係，摻雜家長式領導、不干擾主義及互相不信任；俄羅斯統治下的優劣勢反映在它身為對歐洲窗口文化的吸引力、軍事力量的資源，以及其對當地不穩固的支配；當地人與帝國勢力合作或反抗的各種關注和策略，常常是源於當地社會中的權力關係；還有除了其他方面，涉及軍事策略和宗教束縛的帝國勢力之跨國界變革動力。

針對蘇聯歷史研究，中央歐亞專家難對此有特定貢獻，因為國家（和政黨）機構的特色更加標準化，而缺少言論自由也讓本土語言文獻比沙皇時期時更無意義。不過，如同 Arne Haugen、Adrienne Lynn Edgar、Marianne Kamp、地田徹朗等人闡述的，本土行動者對於國家領土的界定、共和國家的建立、婦女的解放以及開發計畫等仍

---

<sup>12</sup> Paul W. Werth,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Armenian Catholicos at Home and Abroad," in Ieda Osamu and Uyama Tomohiko, ed.,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lavic Eurasia and Its Neighboring Worlds*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6), pp.203-35; Naganawa Norihiro, "The Hajj Making Geopolitics, Empire, and Local Politics: A View from the Volga-Ural Region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Alexander Papas, Thomas Welsford, and Thierry Zarccone, eds., *Central Asian Pilgrims: Hajj Routes and Pious Visits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the Hijaz* (Berlin: Klaus Schwarz, 2012), pp.168-98.

<sup>13</sup> 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非常重要；<sup>14</sup>部分研究稱讚了這個雖然創新、但莫斯科中心意味仍十分濃重的蘇聯帝國看法，例如 Terry Martin 有關「積極行動帝國」的論點。Ali İğmen、Timur Dadabaev 等人，取材於口述歷史訪談，介紹了中亞如何在保存或重新定義己身文化與社會關係同時，內化了蘇維埃價值觀與規範。這些作者展示了蘇維埃價值觀跨越種族邊界的適應力，不管最初他們是被強加上去還是自願接受的。<sup>15</sup>蘇維埃與本土文化之間的關係代表的是融合而非共存，這似乎是為什麼最近對蘇維埃的懷舊之情，不只在俄羅斯，也在中亞地區增強的理由；對於蘇聯身為強權的驕傲以及 Brezhnev 領導下的安定感，深植在中亞人心中，並沒有隨著蘇聯終結而消失。

口述歷史在方法上與另一個在中央歐亞研究中很有影響力的學科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文化及社會人類學。中央歐亞地區人類學家的興趣多元到無法被簡單概述，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有些人會嚴謹地著手於「何為蘇聯與後蘇聯社會」這個問題，就連有些社會科學家和史學家也盡量避免回應。這是因為他們必須與一個已現代化，卻尚與西方和第三世界社會相異的社會對抗。它仍存有蘇維埃風格的制度、習慣和觀念（特別是關於種族），又或者蘇聯瓦解對它有嚴重的影響。在日本，吉田世津子、藤本透子和菊田悠分別研究了在吉爾吉斯的蘇聯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終止後，親屬關係網的

<sup>14</sup> Arne Hauge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Republic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Adrienne Lynn Edgar, *Tribal Nation: The Making of Soviet Turkmenist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rianne Kamp, *The New Woman in Uzbekistan: Islam, Modernity, and Unveiling under Commun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Chida Tetsuro,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Brezhnev Time: The Water Development in the Lake Balkhash Bas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54, nos. 1-2(2013):239-64.

<sup>15</sup> Ali İğmen, *Speaking Soviet with an Accent: Culture and Power in Kyrgyzsta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2); Timur Dadabaev, 《記憶の中のソ連—中央アジアの人々の生きた社会主義時代》（筑波：筑波大學出版會，2010年）。

功能與轉變；哈薩克的後蘇聯時期伊斯蘭社會主義復興之經驗的重要性；還有蘇維埃風格的現代化對烏茲別克穆斯林工匠持久的影響力。<sup>16</sup>他們因此對「蘇維埃性實質上是什麼」與「其是如何滲入多元文化社會中」提供了關鍵性的洞察，設定了後蘇聯社會轉變的初始條件，也為正反兩面的社會行為之判斷標準，提供了重要的地區性差異。

人類學方法在政治和經濟研究中被證實是有用的。在遙遠的1990年代，研究者們開始注意到，在蘇聯時期用來取得商品或服務之特權的社會網絡，在這個加劇的貨幣經濟裡，<sup>17</sup>開始適應了上升的現金總額需求。威權統治下，菁英政治之社會網絡的重要性不應該過分簡化地被誇大，就像大量文學作品在宗親政治的主題上缺乏穩固的證據一樣，然而，人際網絡和金錢的確在為了政治變革而動員群眾或個人時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在吉爾吉斯兩個「革命」期間被觀察到的一樣。<sup>18</sup>這些主題的研究對於比較俄羅斯政經的非正式做法很有幫助，像是 Alena Ledeneva、Gulnaz Sharafutdinova 等人研究的。我希望更系統化的比較研究能深入地揭露正式與非正式、全區性與區域性作法之間的關聯，讓我們能夠更生動地了解蘇聯與後蘇聯的狀況。

---

<sup>16</sup> 吉田世津子，《中央アジア農村の親族ネットワーク-クルグズスタン・經濟移行の人類学的研究》（東京：風響社，2004年）；藤本透子，《よみがえる死者儀礼ー現代カザフのイスラーム復興》（東京：風響社，2011年）；菊田悠，《ウズベキスタンの聖者崇敬ー陶器の町とポスト・ソヴィエト時代のイスラーム》（東京：風響社，2013年）。

<sup>17</sup> Deniz Kandiyoti and Ruth Mandel, eds., "Market Reforms, Social Dislocations, and Survival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special issue of *Central Asian Survey* 17, 4 (1998).

<sup>18</sup> Scott Radnitz, *Weapons of the Wealthy: Predatory Regimes and Elite-Led Protests in Central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肆、對於未來中央歐亞研究之建議

區域研究需要比較，因為只有透過比較研究，才能顯示出一個區域或國家的特色了。此時，我們雖需要理論嚴謹的方法，然而學者們遭遇到了某些困難，因為社會科學中大部分理論都立基於已開發國家的經驗，它們並不總是適用於前社會主義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至於現代熱門的量化分析，一遇到非民主或未開發國家就特別容易出問題，因為後者往往缺乏可信的數據。因此，區域比較研究需要理論與經驗並重的方法，包括非統計性資料。研究者必須學習專長外的領域，因為僅僅把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聚集起來，可能會變成「盲人摸象」的情況。

值得一提的是，在擁有歷史悠久價值觀系統和傳統思想、且屬非歐洲語言（例如中文與阿拉伯文）地區的專家，相對地很難與其他地區專家找到共通語言。因此，對提及其他區域研究習以為常的俄羅斯和中央歐亞專家，可能更需整合。對此，北海道大學斯拉夫中央歐亞研究中心近幾年主動進行比較研究，包括「歐亞主要區域勢力之比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 on Major Regional Powers in Eurasia, 2008-13*）及「重塑日本邊界研究」（*Reshaping Japan's Border Studies, 2009-14*）等大型計畫，在動員中國、印度、突厥、日本和前蘇聯研究專家，以及在說明國際關係、政治、經濟、歷史、社會和文化方面成效卓越。在前述過程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各個帝國的史學家在其分析中使用方法的相似程度。很多人都渴望修訂帝國史，以便把為殖民統治辯護以及將帝國僅當成一個「國家牢籠」等甩在身後。我們同樣傾向於研究皇權與社會間生動的互動、跨國界兵力投射、以及思想與人類的流動。在此，我想提到 4 個中央歐亞史學家所貢獻，被認為最有趣的比較帝國史的觀念。

(1) 就像之前提到的，俄羅斯帝國史學家（特別是針對穆斯林區域）一直研究當地對帝國統治的多元態度，而這個見解跟 Ronald Robinson 對大英帝國的「合作」理論相當類似。<sup>19</sup>俄羅斯史學家於 1990 年代開始著手研究時，還不知道 Ronald Robinson 的理論，但他們閱讀了穆斯林知識分子的文稿及俄羅斯歸檔文件後，開始更加留意當地情勢，像是皇權相當仰賴當地貴族、媒介、宗教機構，以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互信或不互信的程度，因而匯聚了俄羅斯帝國與大英帝國中研究之方法。

(2) 中央歐亞穆斯林歷史被放在帝國之間關係史框架中，是有益的，個人最近重新檢驗了「大博弈」歷史，發現小政體（哈薩克汗國、阿古柏酋長國和謝格南）針對大帝國的策略，在帝國擴展與撤退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根據最後分析發現，帝國喜好維持強權的國際秩序，且為保全此目標，隨時準備拋棄當地的合作者。例如長繩宣博的朝覲研究顯示，儘管俄羅斯帝國有反對泛伊斯蘭主義的言詞，卻發現自己不得不去保護朝聖者，目的在與歐洲帝國競爭於穆斯林眼中的聲望，致使其無法忽視或壓制穆斯林宗教生命中重要的習俗，這也驗證了日本帝國史學家山室信一的主張，亦即帝國之間「競爭共生」的存在。<sup>20</sup>

(3)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陸上帝國與海上帝國的差別，同時避免誇大核心與邊陲地區的文化差距，以及皇權與當地社會之間的互動交流。俄羅斯中亞和英屬印度的研究實際上展示很多的相似處。<sup>21</sup>另

---

<sup>19</sup> Ronald Robinson, "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in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ed. Roger Owen and Bob Sutcliffe (London: Longman, 1972), 117-42.

<sup>20</sup> 山室信一，〈国民帝国論の射程〉，收於山本有造編，〈帝國の研究：原理・類型・關係〉（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 年），頁 87-128。

<sup>21</sup> Alexander S. Morrison, *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 1868-1910: A Comparison with*

方面，陸上帝國的瓦解通常比海上帝國更加繁瑣，在響應領土收復主義的新政權之領土界定上是困難重重，就如同俄羅斯最近對烏克蘭和匈牙利持續的海外宗親政治處理的介入所展示。

(4) 現代帝國的比較歷史必須涵蓋非歐洲帝國，例如將日本或鄂圖曼拿來與它們在歐洲相應的事物來做比較。但個人想強調把當代中國算入現代帝國的重要性，中國佔領東突厥斯坦（新疆）大約跟俄羅斯擴展至哈薩克北部發生在同一時期，但俄羅斯與中國對中亞統治之比較仍是一個有趣且未被探索的研究領域。雖然中亞地區已於 1991 年從前蘇聯獨立出來，但新疆和西藏還是屬於中國。東突厥斯坦與西藏的獨立運動，在 20 世紀比那些在蘇聯治下的中亞地區更為壯大，至於中國對國家地位意識的加強，從蘇聯瓦解中學到的教訓，以及與亞洲內陸人民文化交流不足等，都造成中國堅持以武力維持國家完整之政策。我相信中亞研究將有助於闡明當前中國身為一個現代帝國所扮演的角色。

## 伍、結論

總而言之，中央歐亞研究充滿潛力，但如果它仍然面臨了邊緣化的危機，那我們該採取什麼措施來避免這樣的邊緣化呢？我的觀點有二：首先是如何增加中央歐亞研究在更大的研究領域中的可見度，其次是為進一步研究提出議程。

首先，我們必須且也有自信地證明，中央歐亞研究對於理解俄羅斯帝國及蘇聯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我們的知識與經驗在分析其他前蘇聯區域等地的事件與現象時也很有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我們的領域裡，一直有著各種的衝突案例、失敗的民主

---

*British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化和國際政治危機。例如，在目擊中亞和其他前蘇聯國家對民主化的強烈反對後，我們能輕易地預測「阿拉伯之春」的陶醉感不會持續太久。當克里姆林宮在 2014 年革命後，宣布由烏克蘭議會組成的政府不合法時，我們馬上想到莫斯科是第一個支持吉爾吉斯在 2010 年革命後，用離奇手段（解散國會）建立臨時政府的。後一案例清楚顯示，烏克蘭政府的「不合法」原則上並不是莫斯科介入的首要動機。

其次，雖然中央歐亞研究在過去 20 年還算成功，但也該開始考慮其進一步的研究議程了。很多創新的作品和方法都在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代中期被出版，近幾年，很多能量都集中於更仔細地闡述以前文獻的細節上。特別針對沙皇史，*Russian's Orient*（皇權與殖民社會間二元互動的說明）訂下的研究議程基本上沒怎麼改變，但研究者認知仍有些差別，有些認為這些互動是和諧的（甚至是在法律規範下），其他則強調不和諧。<sup>22</sup>

我們需要怎麼樣的新方法呢？隨著政治與思想史在中央歐亞歷史研究中有了更重要的地位，現在是時候給予其他方面的研究多一點關注，例如經濟、法律和社會歷史學者 Paolo Sartori、Beatrice Penati、Ekaterina Pravilova 等人也是這麼認為。<sup>23</sup>這個研究方向對平衡中央歐亞研究的發展，以及比較研究議題的多樣化無疑是必要

---

<sup>22</sup> Uyama Tomohiko, "A Particularist Empire: The Russian Policies of Christianization and Military Conscript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Uyama, ed., *Empire, Islam,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Eurasi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7), pp.23-63; "Introduction: Asiatic Russia as a Space for Asymmetric Interaction," in Uyama, ed., *Asiatic Russia: Imperial Power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1-9.

<sup>23</sup> Paolo Sartori, ed., *Exploration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Central Asia (19th-Early 20th Century)* (Leiden: Brill, 2013); Beatrice Penati, "The Cotton Boom and the Land Tax in Russian Turkestan (1880s—1915)," *Kritika* 14:4(2013), pp.741-74; Ekaterina Pravilova, "The Property of Empire: Islamic Law and Russian Agrarian Policy in Transcaucasia and Turkestan," *Kritika* 12:2(2011), pp.353-86.

的，雖然這方面的研究者有時候會在細節鑽牛角尖，而不是努力想出新的理論方法。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思考進一步研究的議程，在這方面，最近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和它們在前蘇聯區域的影響，或許鼓勵我們用新的方向去重新思考歷史與當代的議題。在 1990 年代，當很多人期待當代俄羅斯成為一個（雖有難度）對種族關係更寬容的「普通國家」時，強調俄羅斯帝國中和諧互動的研究風潮跟著出現。當人們開始將蘇聯當成一個有趣且「不同於以往的文化」時，諸如「積極行動帝國」等對蘇聯的理性觀點也開始出現。但在 20 年後，俄羅斯國內政策和對外作為顯然偏離了那些已開發國家，然而對蘇維埃的懷舊之情並沒有消失。

在此，個人並非要提倡回歸「國家牢籠」原型以及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二元體制，將俄羅斯與蘇聯當成「不正常國家」看待，並將現在俄羅斯作為產生的好戰印象投射到過去。但我們過去是否有點太過為俄羅斯與蘇聯找出合理解釋，並過度強調那邊和諧的權力關係？畢竟如同其他帝國，俄羅斯和蘇聯在戰爭、掠奪、暴力、歧視、經濟和社會災害都有豐富的歷史。隨著諸如佔領塔什干 150 周年，中亞 1916 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戰 100 周年，大清洗 80 周年，以及經濟改革和阿拉木圖十二月事件 30 周年等紀念日陸續到來，相信藉由研究這些和其他的主題，研究中央歐亞和前蘇聯邊陲國家的專家可以在俄羅斯和蘇聯帝國研究之進一步創新裡，扮演關鍵的角色，就像 Ronald Robinson 曾經說過的：「帝國主義的中央結構，正位於殖民地和邊陲區域裡頭」。

（翻譯：陳宛琳）

